

#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趋同论”的几点思考

程 又 中

(华中师范大学 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 20世纪40-80年代流行于西方学术界的“趋同论”,在一般含义上是指当时的苏联式社会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差别将逐渐消除,“两制”将发展为一种新制度;在具体含义上,是指“两制”根本区别之外的体制成分的趋近。“趋同论”是在观察当时“两制”表面现象基础上对“两制”关系发展趋势的一次初步的、肤浅的把握。它虽有片面性,但不失为对“两制”关系予以认识的全过程中的一个片段。今天的任务,是理论联系实际,把对“两制”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推向深入。

**【关键词】**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趋同论”;深入

**【中图分类号】** D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527(2002)06-0012-02

在一百多年前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人类实践还没有提出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简称“两制”)的关系问题,因为那时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还未从资本主义中产生出来。近百年前的列宁时代,虽然人类有了苏联这样一个最早的社会主义国家,但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个国家并未建成,因此实践向列宁提出的与其说是我们今天面对的“两制”关系问题,不如说是正在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的国家同一系列与之对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问题。在人类历史上,实践向人们提出完整意义上的“两制”关系问题,准确地说是苏联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诞生了从生产关系到上层建筑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新型社会制度之后。正因为从20世纪30年代起世界范围内既有社会主义制度和实行这一制度的国家,又有资本主义制度和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是两种制度在世界上并存,所以才产生了人们不只是在理论上而且在实际生活中都必须正视的“两制”关系问题。

在“两制”并存迄今的半个多世纪里,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有不同的发展,它们之间的关系也非一成不变。在这种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上个世纪40-80年代西方学术界曾流行过一个论点,认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目前存在的差别将逐渐消除,最后融合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制度。此即“趋同论”。它流传到国内,至今影响犹存。那么“趋同论”的思想是什么,我们应如何理解它呢?

如果我们对“趋同论”产生的历史背景、源流、论据及由此得出的具体结论作一详尽的考察,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虽然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态势不同时,西方“趋同论”者对“趋同”目标的预言有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不同,但更多的则认为“趋同”之“同”是既非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也非西方的资本主义,而是一种新型的社会制度。

当40年代初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效率、推动社会和谐和进步方面表现出当时资本主义制度所无法企及的巨大作用时,“趋同论”的早期代表人物约瑟夫·熊彼特提出,“在资本主义体制范围内的逐步社会主义化,不仅是可能的甚至是最明显的可以指望的事情”。(见约瑟夫·熊彼特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而50年代末至70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又一次科技和产业革命,经济高速增长,国家垄断资本的实力和国家调控经济的力度加大,资本主义靠着不断自我调节创造了甚于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一时“繁荣”。这时西方有的“趋同论”者则提出,“资本主义发展水平高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得不单方面趋近于西方制度模式”(见罗斯托著《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不过,在西方“趋同论”者中,除有这种或者资本主义趋向于社会主义、或者社会主义趋近于资本主义的两种对立的“趋同”论点外,更多的人,如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和稍晚些的美国的小马里恩·利维、贝尔和托夫勒等,都没有在“趋同”的目标

**【收稿日期】** 2002-09-12

**【作者简介】** 程又中(1953—),男,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主要研究当代社会主义和国际政治。

是“同”于社会主义还是“同”于资本主义这一问题上下过非此即彼的结论。索罗金认为当时的“两制”将趋同为混合的社会化类型,“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型式”;加尔布雷思认为苏联和西方的两种经济制度将趋同为一个“新工业国”;雷蒙·阿隆认为作为同一工业社会两种形式的苏联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将向更加进步的同一社会类型演进;托夫勒则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第二次浪潮”的产物,它们都将在“第三次浪潮”中进入一个“新社会”,在这个“新社会”中,不再存在所有制问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差别将消除。显然,在多数“趋同论”者的笔下,当时由苏联制度和西方制度为代表的“两制”将“趋同”为另一种更高级的新制度,虽然他们对这种新制度有“混合型”、“进步工业社会”、“新工业国”、“新社会”等不同的表述。

第二,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西方“趋同论”者根据当时两种社会的表面现象所预言的“两制”趋同,实际上是指“两制”中某些体制成分的“趋同”,同时把“两制”的根本区别放到了一边。

在20世纪的较长时间内,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如把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公有制,资本主义是私有制,“两制”纯而又纯,势不两立等,不独影响了社会主义国家及其学术界,导致社会主义国家教条主义盛行,没有搞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变化和发展;而且也影响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及其学术界,使之认识不到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区别和联系。在这样一个思想背景下,当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为适应生产力发展而在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经济社会运行的调节手段和管理方式上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从而使两种社会出现了相似或相同的一些体制和机制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经济、社会和政治学家,就开始进行现象与现象的对比,进而对两种社会中的相似和相同点作出他们力所能及的解释。在这些解释中,依照传统观念难以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划分归属,于两种社会制度中都存在的那些相似和相同点,被置于话语中心,予以强调,突出“同”,而将两种社会制度的差异和不同处或一语带过或搁置起来,淡化“异”。这种见“同”忘“异”的解释,虽不全面,但在学术活动中也是难以避免的事。然而,正是这种对“两制”中相似和相同点的强调,对“两制”间根本区别的忽视,导致西方“趋同论”者所预言的“两制”趋同事实上主要是“两制”中某些体制和机制成分的趋同。对此可以为证的,是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根据苏联和西方国家在经济中都运用计划方法,指出“苏联和西方两种经济制度在计划上趋同”;布热津斯基和亨廷顿依据美国和苏联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提出美国和苏联“在技术行政上趋同”;其他由对美苏两国教育、科技、艺术、宗教、家庭婚姻状况的对比分析中提出在社会体制上趋同;等等。

既然西方“趋同论”者所谓的“趋同”,在一般含义上,是指当时的“两制”将发展为同一种“新制度”(“新国家”、“新社

会”),具体含义上是指“两制”根本区别之外的体制成分的趋近,那么显然,这样的“趋同论”就并非毫无客观依据的主观臆想,而是在观察“两制”当时表象基础上对“两制”关系未来发展的一次初步的、肤浅的把握。这是因为:

第一,“趋同论”不是单纯的主观臆想。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但是在这一客观规律所指向的历史结局最终出现之前,西方“趋同论”者面对的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制并存的世界。其中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处在探索改革和完善当中,正尝试学习引进资本主义已运用自如的某些经济管理机制和手段,以求激活效益日渐低下的计划经济;另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正在资本主义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对经济社会运行和管理机制进行调整和改良,包括借鉴社会主义的经济计划方法、社会保障制度等,以便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新的空间,缓和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阶级和社会矛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借鉴,取长补短,谁战胜谁尚未见分晓,20世纪40—80年代的这种“两制”现状,自然成为“趋同论”从中而来的客观存在。

第二,“趋同论”是在“两制”关系发展的早期阶段对“两制”关系未来发展趋势的一次片面的、肤浅的把握。在世界历史进程中,20世纪40—80年代是“两制”关系发展的早期阶段。这个阶段上,由内在矛盾所决定的“两制”发展规律,还只是在社会主义年幼弱小和资本主义老到强大的条件下刚刚发生作用,“两制”矛盾运动在相互联系、依存、斗争和转化诸方面的情况和特点尚未充分展现出来。因此,处在这一阶段的西方“趋同论”者,往往根据当前“两制”中共有的某些中性现象,对“两制”间的联系和发展趋势仓促作出大体上的把握。由于这种把握忽视了“两制”矛盾的对立而突出了“两制”矛盾的统一,因而表现出明显的片面性和肤浅性。然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提醒我们,客观事物及其矛盾是在“自己的运动”中不断变化和永恒发展的,因此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也必然经由一个从不知到知,从片面的、肤浅的知到全面的、深刻的知这样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看,受主客观条件(如“两制”关系发展的方面和程度,当事人的阶级立场和思想方法,等等)的限制,西方国家某些人的所谓“趋同论”不可能做到全面和深刻,然而,它仍不失为对“两制”关系未来发展趋势予以认识的全过程中的一个片段和关于“两制”关系发展规律全部认识中的一个成分。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趋同论”在西方的影响逐渐式微,与此同时,“两制”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任务,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紧密结合实际,全面深入地考察“两制”关系的现状,准确把握“两制”关系的新特点和发展趋势,把对“两制”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推向深入。

[责任编辑 唐 鸣]